

语文知识精要丛书

# 散 文 概 说

阮 忠 著

---

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

1999 年 · 武汉

# (鄂)新登字 11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散文概说/阮忠著.—武汉: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,  
1999.6

(语文知识精要丛书 )

ISBN 7-5622-1985-0 I·138

. 散... . 阮... . 散文 - 文学研究 - 中国  
. I 207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8)第 33086 号

## 散文概说

(语文知识精要丛书 )

阮忠著

---

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武昌桂子山 邮编:430079)

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

文字六 三厂印刷

---

责任编辑:王文戈

封面设计:甘英

责任校对:罗少琳

督印:方汉江

---

开本:850×1168 1/32

印张:9.75 字数:245千字

版次:1999年6月第1版

1999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-3000

定价:15.00元

---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可向承印厂调换。

## 引 言

在中国这块肥沃的土地上，散文源远流长，从殷商王朝到当代社会，悠悠四千年，文人才思的纵横驰骋，引发缤纷的散文花朵争奇斗艳。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，写散文的人没有明言他所写的就是散文。

以短篇小说集《沉沦》登上文坛，并在现代文学界享有盛誉的郁达夫也许没有想到，他在编定《中国新文学大系·散文二集》的时候，为引导读者读这部散文集写下的《导言》，就散文的名称所作的“中国向来没有‘散文’这一个名字”的论断，使他与散文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。郁达夫自称他是“臆断”，偏偏他没有在这里打住，文思如流的他止不住又说：“若我的臆断不错的话，则我们现在所用的‘散文’两字，还是西方文化东渐后的产品，或者简直是翻译也说不定。”时值1935年。

郁达夫的“臆断”很快就被人们发现真的是臆断。现代的散文研究者们竟是那样喜欢引用它，不是为了宣扬他的正确，而是批评他的不正确。因为人们在翻检历史的时候，获得铁证：“散文”一词，早就有了，既不能说没有，也不能说是西方的产品。

这可以归功于南宋的罗大经，他在《鹤林玉露》这部笔记里，记载南宋曾官至丞相、并在文坛上很有名望的周益公

为刘 的死写的挽辞：“岑彭殒而公孙亡，诸葛死而仲达走。虽成功有命，皆莫究于生前；而遗烈在人，可徐观于身后。”读到这挽辞的人都很佩服对仗的工整、妥帖。而周益公也很津津乐道，和杨东山谈论过它：“起头两句，须要下四句议论承贴，四六特拘对耳；其立意措词，贵于浑融有味，与散文同。”他还在其他地方也提到散文。

周益公只是说他的挽辞的韵味与“散文”相同，并没有说什么是散文。不过，从他挽辞的语言表现风格可以看出来，散文的语言形式应该是后来人们常说的散行单句，不受任何音律、对仗的束缚。还可以作为理由的是，“散文”的提法在南宋以后渐多，往往和骈文对举，也见散文最初是被视为诗歌之外的非骈偶之文的。

很有意思的是，1936年，钟情于散文的陈柱在《中国散文史》一书的“总论”里冒出一句，“散文一名，尤为不通”。他说不通，是用了《庄子·人间世》的“散木”为证。庄子是说过“散木”的话，并说散木用来造船，船会沉没；造棺椁，棺椁会很快腐烂；造器具，器具会很快毁坏等等，一句话是散木无用。最著名的《庄子》注释家、魏晋时人郭象也说，散木是没有什么用处的树木。以此来理解“散文”，那不是散文成了没有用处的文章吗？这显然是不合适的。但实际上，陈柱还是肯定了“散文”，不然的话，哪会有他的《中国散文史》问世呢？

对于散文“散”的理解，不必拘泥于庄子说的“散”，庄子用它修饰、限定树木或人，而不是文。况且“散”的本

义是分散，所谓的“散木”是无用的树木，其实是说树木的质地松散不合用，这还是从“散”的本义引申出来的。

“散文”的名称在南宋才产生，但散文不是南宋才有的。在南宋以前的漫长岁月里，散文被泛泛地称为“文”，甚至只是“文”中的一部分。“文”中除了散文外，还有诗歌。这促使我们有心地注意一下最初的“文”是什么。

可不要贸然认为“文”就是“文学”。春秋时期就有“文学”之名，它让我们想到因材施教的孔子，他办私学，门下四科：德行、言语、政事、文学。“文学”说的是文章博学。西汉也用“文学”，实指的是儒学和儒学经典，并选饱学之士担任文学祭酒、文学掌故的官。它们与散文之“文”有很大的距离。

也不要说“文”就等于“文章”。孔子曾经说：尧为天子，真是伟大呀！他的事业成功，“文章”光采焕发。这“文章”说的是礼乐法度。庄子曾经劝人以无为来有为，其中打了个比方，说是人要想使眼睛明亮，就应该“灭文章，散五采”。这“文章”说的是彩色花纹。汉以后才渐以文章为独立的文字，魏晋的曹丕论文，“文”就指的是“文章”，他在《典论·论文》里说了“盖文章，经国之大业，不朽之盛事”；文章的“本同末异”，并把奏议、书论、铭诔、诗赋都归于“文章”，西晋的挚虞作《文章流别论》概论文章，把诗赋及记叙议论之文统属其下，说明那时节“文章”没有严格的分野。但“文章”已经倾向于现在意义上的文学，并和“文”的意义类似了。

以后有了文、笔之争，并在南北朝时期流行一时。当时，纵观古今文坛、饱读诗书的刘勰就说，“今之常言，有

文有笔，以为无韵者笔也，有韵者文也。”文笔是文体的分类，什么属于“文”，什么属于“笔”，人们的意见并不一致，善发宏论的刘勰以无韵为笔，有韵为文，还有不好划分的则别为一类。与他同时代的梁元帝肖绎，则说文笔有古今的差异，古代以通圣人经典为笔，当今则以说理的奏章为笔；古代以辞赋为文，当今则以抒发情思的歌谣为文。从这里来看，他们说的“笔”自然隶属于散文，他们说的“文”中，也有一部分是有韵的散文，如辞赋、骈文。到南北朝“骈文”之说和唐代“古文”之说兴起，骈文不被视为散文，随物赋形、文从字顺的古文，则是典型的散文，随后自然产生了罗大经的“散文”之说。“文”主要还是指的“文章”，包括了有韵的和无韵的文章，而不是诗、词、歌谣。

现在说散文，不再有古人那么多的讲究，虽然说进入现代的20到40年代，写散文、谈散文的风气大盛，爱散文的人们似乎也有魏晋时人三天不谈老庄则舌根僵硬的风采，不能够须臾离舍散文；虽然有人称散文为“美文”，又有“纯散文”、“絮语散文”的说法，但大体上把它视为文学的一支，实际上有的是纯文学的散文，有的不是纯文学的散文。

这和古代的情形有些类似。像春秋战国的散文，向来有一句广为流传的评语：文学、历史、哲学不分家。被当作文学的散文作品，同时是历史著述、哲学著述。这是由于社会政治是一切的核心，它向不同的方向辐射，把不同的学科、不同的学说连贯成为一个和谐的整体，不顾及彼此的分野，

---

见范文澜：《文心雕龙注》，下册第655页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。

也就没有严格的界限，历史学家是文学家，哲学家也是文学家，散文没有取得独立的地位是很自然的事情。

于是，当我们徜徉在文学长河，放眼通观散文走过的足迹，它向我们展示了两个不同的散文世界：广义的散文世界和狭义的散文世界。林非曾经就狭义散文和广义散文说了这样一句话：“狭义散文以抒情性为侧重，融合形象的叙事与精辟的议论；而广义散文则以议论性和叙事性为侧重，在不同程度上融合抒情性。这二者在‘五四’之后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。就狭义散文领域而言有小品、随笔、游记、日记、书信这些体裁，就广义散文领域而言有杂文、政论、学术小品、序跋、回忆录、人物特写、报告文学、传记文学这些体裁。”实际的情形比这复杂得多，散文抒情、叙事、议论三者的交错，被林非划分为狭义散文和广义散文的文体的交错，让人很难确定一条互不侵犯的界河。倒是不妨说广义的散文包括了一切文学与非文学的散文，狭义的散文则只是文学散文。我们要进入的是广义的散文世界，在那里更能开阔我们的视野，便于欣赏散文家的英姿，欣赏林林总总散文的流光异彩。

对散文历史的回溯，我们不知不觉地面临了散文赋予的美丽的迷惑。我国所拥有的散文家、所拥有的散文，足以让人惊叹这个诗歌的国度同时是散文的国度。古往今来，散文家摩肩接踵，散文层出不穷，谈天说地，道古论今，社会家庭、山川风物无不入散文之林，使人目不暇接，不禁要问：我们将要走向哪里？

---

林非：《散文论》，第5页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。

走向散文的历史，走向散文的现在。

无论怎样璀璨的生活现实都是一步一步从远古走过来的。此时此刻，当我们走进历史的时候，历史上的散文家也正朝我们走来，与我们产生思想与情感的交流，让我们感叹一代代人对社会的贡献创造了历史，也为现实奠定了基石。

走进历史，是以古为鉴，社会生活如此，散文也如此。我们当然不希望现实散文的业绩，是古代散文家弃而不用 的弊履，当我们劳神费力，自以为创新，猛回首才发现蹈了前人的旧辙。表面上教训并不惨痛，实际上我们空耗了自己的光阴，在人的生命历程中，哪有比空耗光阴更为惨痛的事情？

了解散文的历史，不意味着沉浸其间，陶然自乐。现代研究者和创作者的使命是在走进历史以后又走出历史，重塑散文的现在，使散文在历史上的精华得以再生，使散文的现在是在历史基点上的现在，而没有停留在原始的水平之上。那么，当现代人倾心于散文的时候，同时就肩负了重塑散文的重任。这也许会使我们惴惴不安，不知道散文会不会在我们的手上掀开崭新的一页？

掀开散文新的一页，为的是要掀开生活新的一页。生活的常新将会带来散文的常新，热爱生活的人们，没有理由对散文失去信心。所以，我们乐于对散文理论作些探讨和勾勒，让灰色的理论滋补那生活土地上常青的散文之树，以便开出更加灿烂的散文之花。于是，给予我们审美愉悦的散文，将会同时使我们得到一种文化的熏陶。我想，一定会的！

# 1 蹒跚的步履走向了初度的辉煌

我们远古的祖先，在结绳为治、刀耕火种的时候，茹毛饮血，巢居穴处，何曾想到要创造文学，更不用说是散文！

人在求生于自然，求生于社会的和谐与冲突之中，不知道经历了多少年代，纯粹的物质追寻终于演化成在追寻物质的时候，也追求思想、情感的表达和交流，于是文学在生活的孕育中，从实用的文字苑囿里走了出来，虽说犹若呱呱落地的婴儿一样稚嫩，但毕竟是新的生活天地。

社会生活的发展、成熟，注定了文学会和它一道发展、成熟；社会生活的丰富必然导致文学形式和风格的丰富。文学裂变怎样发生，不是这里所能探究，我们面对的事实是：自从有了文学以后，散文就与诗歌相偕而行，是文学里贯穿古今的一大河流，两千多年以来，一仍生机盎然。

但谁知道，散文之初，是怎样迈着蹒跚的步履走向第一次辉煌？

## § 1 散文萌生和最初的模样

苍颉造字是很古老的传说，造字是不是可以等同于文学创作则很难说清道明。按理说，远古结绳记事既然为苍颉造的字所取代，那苍颉造字大概也是为了记事，造字的简洁或

繁琐自然不会改变记事的性质，而记事的文字用后世文学家的眼光看来，也就是文学。这有点类似鲁迅在《门外文谈》中说的文学起源于劳动号子，即“杭育杭育派”。这样说真的有些玄，苍颉造字本不可知，又怎么能够生出苍颉造字记事的说法，说那就是文学呢？不过，文学的起源应该从文字算起，没有文字就没有文学。但最早的文字据说是四千五百年前的象形陶文，那是在大汶口文化的陶器上发现的，只是发现的陶文数量很少，而且很难辨识，是否应该归于散文实在是个问题。对此，不妨姑且存疑，还是从真正有文字记载并算得上是散文初步的时代说起。

这话其实留了一点余地，话中的话是有些文字记载算不上散文，或者说是算不上萌芽时期的散文。为什么呢？是因为有些文字记载从时间上看是够早的，实际上是后人的比附。典型的例子是《尚书》的“虞书”、“夏书”为后人伪托，还有清代严可均辑的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》里提到的炎帝、黄帝之书。

散文初步，从朝代看，最早的是在公元前16世纪至11世纪的殷商王朝。

殷商王朝是商汤王创建的，他本是夏桀的旧臣，在夏桀的暴虐统治时期，民怨鼎沸，有歌谣咒夏桀：“是日何时丧，予与女皆亡。”汤则在他的领地施行仁德之治，连狩猎也是网开三面，感动了诸侯，随顺汤兴师灭了夏桀，以“商”为国号，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。商汤传十代到盘庚，其间多次迁都，商仍然称为商。到盘庚时，盘庚为避水患，保国安民，动员百姓把国都从奄（今山东曲阜旧城东）迁到殷（今河南安阳西北），依恋故土的大臣和百姓拗不过盘庚的决心，

跟随盘庚迁都到殷，后来，人们称商为殷，或者是殷商。商王朝从盘庚传到末代君主商纣王共八代十二王，到商纣王的时候，商纣王自恃他“资辨捷疾，闻见甚敏；材力过人，手格猛兽；知足以距谏，言足以饰非”，荒淫凶残，最终在周武王率诸侯的讨伐中，登鹿台自焚身死，商王朝也就灭亡了。

殷商是在夏王朝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，在社会制度、生产、文化等众多的方面比夏王朝进步。在文学上，作为殷商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不是《尚书》中的《商书》，而是甲骨散文。因为甲骨散文中的文字比《商书》更为古老，以至在挖掘出来的十几万片甲骨中发现的近五千个文字，现在能够辨识的不足二千个。它们在记述社会生活上有镌刻的困难，记述本身没有达到《商书》的水平。甲骨文的发现有很有趣的传说，那是在1898年前后，河南安阳的农民在种地时发现了甲骨，他们称为龙骨，用来治病或者是卖给古董商换几个零花钱，有古董商范寿轩收购，传来传去，传到国子监祭酒王懿荣那里，博学多识的王懿荣发现甲骨上的刻痕原来是商朝占卜的文字，引起轰动。

甲骨文的“甲”是龟甲，“骨”是兽骨，因为文字多是刻在上面的，内容多是占卜，所以甲骨文有契文、卜辞之称。现在说这些记述是甲骨散文，应该首先说一句，它们并不是为文学的散文，而是为生活的记述，是生活的语言翻版，尽管它们远不及生活本身细腻、生动和富有情趣。根据现在人们的研究，甲骨文在记述上已经有了完整的篇章，一

---

司马迁：《殷本纪》，《史记》第1册第105页，中华书局1975年版。

般分为叙辞、命辞、占辞、验辞四个部分，包括了占卜的时间、地点，占卜人，占卜的事，占卜的判断和应验与否。这表明当时的人们在记述上有了相当完整的概念，从记述的风格上看，简明朴素是一种基本的原则。其中最简明而且最具有文学色彩的是常为人道的：“癸卯卜，今日雨。其自西来雨？其自东来雨？其自北来雨？其自南来雨？”在这里，它告诉人们占卜的时间、占卜之事，并以猜度的复叠语言形式表明对“今日雨”来自何方的疑惑，正是这种语言形式使它的文学韵味自然而生。甲骨文中类似的卜辞还有，占卜中注意东南西北的地理方位以及因此形成的语言复叠形式，虽然可以视为散文的铺陈，但也可以让人感到它似乎是诗歌的铺陈。读到它而又熟悉汉乐府诗的人，会想到一首题为《江南》的汉乐府诗：“江南可采莲，莲叶何田田。鱼戏莲叶间。鱼戏莲叶东，鱼戏莲叶西，鱼戏莲叶南，鱼戏莲叶北。”这首民间歌曲歌唱江南人采莲的欢快，以鱼之“戏”表现采莲人之戏，婉转动人。把“今日雨”的卜辞和这首诗相比较，语言表现形式上的相类似，使“今日雨”给人似文也似诗的感觉。

甲骨散文的这种表现形式受占卜人行为性质和思维方式的影响，直接影响到《周易》，使《周易》的语言也有作为散文初步时的甲骨文的风格。《周易》是一部卜筮的书，它的产生在殷商末年、西周初年，创造者流传较广的传说是伏羲模天范地，远取诸物，近取诸身创八卦，西伯即后人尊奉的周文王被商纣王拘禁在 里的时候，根据八卦推演为 64 卦，384 爻。像西汉的司马迁就不止一次地说西伯演《周易》。实际上《周易》的作者是谁很难确知。现传的《周易》

分为经、传两个部分，经是《周易》本文，传则是战国时解释《周易》的文字，因经而发不能视为经，这里说的《周易》专指经而不言传。《周易》在形式上有两个部分，一是卦象、爻象，二是解释卦象、爻象的卦爻辞，作为散文的《周易》是其中的卦爻辞。卦爻辞是对卜筮的卦象、爻象的解说，它的内容主要是针对卜筮的对象、过程及卜筮者主观臆测的结果作些记述和说明。但它不同于甲骨占卜的是往往没有采用纯记实的手法，而是常以喻象说事，用“立象以尽意”的方式表述卜筮的结果，这使《周易》蒙上了一层遮盖真实的轻纱，给人一种朦朦胧胧的感觉，也使《周易》在后人的解说中极大地丰富起来。无论怎样说，《周易》既是卜筮的书，首先要说的就是卜筮之事，办事、出行，看吉利还是不吉利，能行还是不能行；或者是以卜筮帮助自己认识外界事物。从文学上说，《周易》的卦爻辞因为记叙和设喻立象而有两种不同的语言风格，前者直率，如乾卦的“九三”爻：“君子终日乾乾，夕惕若，厉无咎。”说是君子成天勤勉努力，夜晚自我警醒，即使是身处危险的境地也没有灾祸。后者则委婉，如大壮卦的“上六”爻：“羝羊触藩，不能退，不能遂，无攸利，艰则吉。”这里说的公羊触篱笆而夹住了双角，不能退也不能进，没有什么好处。但这种艰难不会长久，结果还是好的。这显然是在立象尽意，含蓄中别有韵味。《周易》的这两种表现方式和风格，语言上都是精炼简短，意味深长。

散文初步从殷商到西周，甲骨文到《周易》是一条线

索，《周易》卦爻辞的文学性比起甲骨文来，实在是迈进了一大步。同时，还有另一条线索，这是后人编辑的《尚书》告诉我们的。

《尚书》原名《书》，西汉儒生把它奉为经典，又称《书经》，被现在的人们视为最早的历史散文集，原有 100 篇，在遭了秦始皇焚书的厄运之后，西汉初年广开献书之路，复兴文化时收集得 29 篇，分为虞、夏、商、周四个部分。但据可知的材料，最早的历史散文并不应该统称为《尚书》，因为《尚书》的最后一篇《秦誓》是春秋时秦穆公派孟明、西乞术、白乙丙长途奔袭郑国，结果在崤山遭晋军伏击，全军覆灭之后的悔过之辞。这意味着《尚书》的成书至少是在秦穆公之后。如果把它统称为最早的历史散文，就会使真正最早的历史散文被淡化了。说最早，剔除后人伪托的《虞书》、《夏书》之外，最早的历史散文该是《尚书》中的《商书》。同时，《尚书》又和以后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散文如《春秋》、《左传》等不一样，它们并不是被作为历史来记叙的，而是当时人的记录，其中有的经过后人的修饰润色。《尚书》所记则主要是君王的训词、诰令，直接关系到国家政治，所以荀子说：“《书》者，政事之纪也。”在这个意义上，《尚书》应该是第一部政治散文集，不过在后人心目中，《尚书》就成了历史的记录。

由于年代的久远和语言的差异，《尚书》在唐代的时候就很难读。博学的韩愈就说过：“周诰殷盘，诘屈聱牙”，

荀子：《劝学》，《诸子集成》第 2 册第 7 页，中华书局 1954 年版。

韩愈：《进学解》，《韩昌黎文集》第 26 页，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7 年版。

流传到现在，更让人感到晦涩。人们当然不能想象几千年前的通俗语言到几千年后仍然是通俗语言，其实从那时候到现在，语言和文风的变化正标示着散文的发展历程。韩愈说的“周诰殷盘”，“周诰”指的《尚书》的《周书》，“殷盘”则指的是《尚书》的《商书·盘庚》篇。

今传的《商书》，可信的只有《盘庚》上中下三篇。它是盘庚决定迁殷时给不愿动迁的臣民作的训词。这篇训词主要是说明为什么要把商的都城迁到殷这个地方，他在对臣民的严厉训斥和耐心规劝中，很善于把抽象的说理用形象生动的比喻表现出来，有的还成了众所周知的成语。如他说，迁都的上令下行，“若网在纲，有条不紊；若农服田，力穡乃亦有秋”。这话真的说得很动人，也很有分量，群臣众民听从他的指令，生活就会井井有条，就会像农民种田，努力之后就会有好的收成。又如他说群臣以流言蛊惑人心，后果是很严重的，“若火之燎于原，不可向迓，其犹可扑灭？”这使他的说理显得很有生气。

其后则有《周书》的流行。《周书》今传 19 篇，篇目既多，内容也就不像《盘庚》那样单一。同时，由于《周书》多出自公元前 10 世纪的西周初年，殷商覆灭的教训使西周人对敬天保民以使江山永固更显得精心、警惕，因此涉及到社会政治的众多方面，如思想意识、法令制度等等。《周书》也多劝诫之词，由于劝诫对象的身份、地位，语言娓娓动人，婉转而深富意味，像召公劝诫周武王修身敬德，不要玩人丧德，玩物丧志；周公劝诫周成王要吸取历史的教训，不要贪图安逸。在劝诫中，情感的真切和引事设喻的真切融合在一起，以理服人，也以情感动人。虽然说他们的劝诫有政

治用心，但目光的远大也表现出政治家的襟怀。

《商书·盘庚》、《周书》和甲骨文、《周易》的风格有很大的差异，甲骨文和《周易》的短章中蕴含有诗的意味，《商书·盘庚》和《周书》则是长篇的散文。尽管说它们的文学意味不是很浓，但记叙、说理已经比较富于曲折、变化，为散文的发展开了先路。

## § 2 历史的轨迹转化为记叙散文

社会生活中鲜活的每时每刻在无情的岁月风雨中洗刷，不仅是“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”，而且平凡的人生也如孔子见河水奔流而感慨的“逝者如斯”。现实成为历史，生活留下的轨迹却不是很快就磨灭的，于是有了有意地存留生活轨迹的史官出现，有了睹今思昔、要以古为鉴的历史学家出现，他们重的是历史，记述历史却不单是文字形式，也是文学形式，使历史与文学不能分，结果就有了人所称道的历史散文。

说起来，历史散文的传统和史官传统是一脉相承。公元前 770 年周平王东迁开始春秋时代以前，史官各有职责，世传左史记言，右史记事，这左右先是方位，然后才是官名。二者同样面对已经发生的人物言论和事情，而有不同的记述方向，记言的专于记言，记事的专于记事。于是有了言为《尚书》、事为《春秋》的说法，表明早期的历史散文言与事的分立。这到《左传》的产生才打破。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曾评价道：“逮左氏为书，不遵古法，言之与事，同在传

中。然而言事相兼，烦省合理，故使读者寻绎不倦，览讽忘疲。”从此开创了历史散文的新局面。

然而，真正开启历史散文繁荣的不是《商书》，也不是《周书》，而是一部春秋时期鲁国的编年史《春秋》。当时，诸侯纷争，各诸侯国都记载自己国家的历史，多名“春秋”，所以博学的墨子就曾说他见过百国“春秋”。也有不名“春秋”的，如晋国的史书称为“乘”，楚国的史书称为“机”。然而，除了鲁国的这部编年史之外，其他诸侯国的史书都不流传。孟子曾说鲁国的《春秋》是孔子见天下衰微，君臣、父子失礼，故作《春秋》以正人伦，人们一般认为孔子修订过鲁国的《春秋》，因为孔子自己说《春秋》会给他带来美名，也会给他带来恶名。

虽说《春秋》是鲁国的编年史，所记并不纯是鲁国的事，同时记述了从鲁隐公元年（前 722）到鲁哀公十四年（前 481）诸侯国的大事，使它在实际上成了观察春秋社会大舞台的窗口，那一时期的重大事件和各色人物都得到表现，在这一过程中，《春秋》真如班固所说，记事而不记言，记事以简明见长，增一字则文繁，减一字则意断。如鲁隐公元年的“夏五月，郑伯克段于鄆”，反映郑庄公和共叔段兄弟之间的权势之争，事件的时间、地点、人物和结果在这九个字里全有了，以简明为原则，对这则记述的增减都无法下手。而且历史学家对这一事件的看法也在其中。难怪唐代的韩愈说“《春秋》谨严”。《左传》对它作过解释，说是：共叔段不像做弟弟的所以不称他为弟；兄弟之间像君主之间，

---

刘知几：《史通》，上海涵芬楼影印本第 2 卷。